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



中共党史专题讲座

(一)

鞍钢党校资料室印

5

说 明

《中共党史专题讲座》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胡华教授、各位讲师在该系进修班授课讲稿。本《讲座》包括党史、思想史、中国革命问题等专题，它反映了当前学术研究中的新成果。

《讲稿》曾印刷过。但因印量有限，未能满足要求；同时，由于付印比较匆促，存在不少错漏之处。

现应许多单位的要求，我们请作者将稿进行了重新修订，并增加一些新的专题，作为内部教学、研究参考资料进行交流。

鞍 钢 党 校 资 料 室

一 九 八 五 年 二 月

目 录

1、学习中共党史·····	胡 华·····	1
2、试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	孙思白·····	2
3、北洋军阀各派系的统治及其特点·····	彭 明·····	7
4、中国无政府主义·····	林章惠·····	17
5、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的社团·····	彭 明·····	55
6、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情况·····	肖效钦·····	113
7、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问题·····	戴鹿鸣·····	133
8、国家主义派的反动政治思想·····	林章惠·····	151
9、戴季陶主义批判·····	林章惠·····	173
10、关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形成问题·····	戴鹿鸣·····	190
11、试论民国时期军阀史的研究·····	孙思白·····	201
12、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教学大纲·····	杨云若·····	206
13、改组派产生及其灭亡·····	林茂生·····	232
14、中国托派·····	林茂生·····	246
15、毛泽东军事路线的形成·····	吴荣宣·····	279
16、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清庆瑞·····	309
17、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	李安葆·····	327
18、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和文化革命的深入·····	戴知贤·····	339
19、新军阀混战史研究提纲·····	张同新·····	359
20、关于第一次大革命的几个问题·····	胡 华·····	382

学习中共党史

中共党史系主任、教授 胡华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史诗般的光辉历史。

中共党史，叙述现代中国可歌可泣的斗争和艰辛宏伟的建设的历程，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辉煌的史页；也是世界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充满了动人心弦的事变和极其丰富的经验的最丰富多采的史页。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应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上，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胡耀邦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主要科学著作之中，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结晶。中共党史就是活生生的行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

无数革命烈士，为中华的崛起，为人民的解放，而慷慨捐躯、视死如归。多少革命先辈，为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胜利，而出生入死、饱经风霜、尽瘁终生。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他们理想的远大、道德的崇高、意志的坚强，是历史上一切古人所不能比拟的。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中共党史则是无产阶级人民英雄的英雄业绩的总汇。

学习中共党史，将帮助我们获得关于现代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极丰富的历史知识。

学习中共党史，将帮助我们获得关于现代中国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经济建设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的知识。

学习中共党史，将帮助我们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关于战略策略的理论，关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和关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理论；也将帮助我们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水平和工作能力。

学习中共党史，将帮助我们较深刻地领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是集中国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和智慧的大成，尤其是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优秀思想和智慧的大成，是中国人民、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经验的结晶，是我们事业的成功指针。

学习中共党史，将帮助我们较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在我们的斗争中发生过的失误和挫折，从历史上的失败和挫折中吸取教训，尤其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失败乃成功之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殷鉴不远，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重犯历史上犯过的错误，使我们今后的事业进行得更顺利些。

学习中共党史，将帮助我们学习先烈先辈的崇高理想、高尚的道德品质。先烈先辈将给我们以榜样的力量，激励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建设我们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张志新烈士在她的自述中讲过：她在人民大学系统地学习了包括中国革命史（党史）的四门政治理论课，这四门理论课，帮助她树立了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心，帮助她决心为真理而献身。可见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革命理论、革命历史的教育，对一个青年的革命世界观的形成，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张志新烈士的名字，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光荣。

与伟大的中国革命和宏伟的社会主义实践相比，我们还缺乏与之相称的党史、中国革命史著作和英烈们的传记等。这方面专著还是太少，这方面的教育和研究也急需加强。例如，我们还没有一部较详尽的抗日战争史。因此，党史研究的前途无比宽广。我们热忱希望有更多的有志青年，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将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教育事业推向前进。

试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

孙 思 白

历史与现实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历史是什么？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什么？是将来的历史。

时间被人们划分为“过去”、“现在”、“将来”。李大钊同志说过：“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①。文化流转不停地把“过去”、“现在”、“将来”串联在一起；成为过去的历史当然会与现在有联系，并与将来也有联系。但“过去”毕竟不是“现在”和“将来”，古人毕竟不是现代人与未来人。因此，历史与现实、未来之间，就必然又有区别的一面。

抛开“未来”不讲，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总是既联系又区别地构成它对立统一的关系。

世界上的政治家们把精力主要地放在把握现实上（当然不是说就不借鉴过去），古今历史学者把精力主要地放在探索过去上（当然也不是说就忽视现实）。

古往今来的历史家在记述论证人类过去活动的历程中不完全一样。多数一开始就预定了自己的目的，如孔子的“寓褒贬”、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之类。但容有个人也许真的不曾预定什么目的，如出于兴趣之类。即使这个别的人，只要他忠实于史实，方法上比较合理，其所记所想，迟早也许会多少有点用处。

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治史的人有自己明确的目的性。他们是自觉地探讨历史现象与本质，考察各种社会运动的规律，总结过去，求训致用；理所当然地重视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解放前旧的史学著述中，虽不乏有价值的成果，但有一种脱离现实以至流入烦琐的严重倾向，是都记得的。新中国建立之初，在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中，学术界要求扭转过去那种倾向是自然的、正当的。为破除那种旧倾向，史学界曾提出许多口号；其中“历史研究应为现实政治服务”可以算是一个总口号，把这个口号的精神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衡量，针痼救弊应该说是无可非议，并且事实上也曾收到巨大效益。但是当人们有意无意地离开了它的针对性而简单化时，就容易流入偏颇。“历史翻案”，

就一切皆翻：“厚今薄古”，就倒讲历史；“古为今用”，就把古人现代化起来，这中间的症结之一，是强调历史与现实联系时，忘记了历史与现实还有区别。

林彪、“四人帮”发明的“影射史学”与上述一类口号是否有关？我觉得如果把会“影射”的祸害统统归之于上述口号，恐未尽确切，因为极“左”思潮另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不过，影射家们曾利用了这类口号（如“为政治服务”、“古为今用”等）而偷梁换柱，迷乱了人们的视线，也是事实。

“影射学”的主要手法集中到一点上，不外是把“历史”与“现实”（政治）两个不同领域中的存在生拉硬扯地挂勾搭桥，或者是把现实拉回历史，或者是把历史扯进现实，使两者发生牵连，以求实现其怀抱的“大欲”。表面好象也是在讲“联系”，求“效用”，而实际变成了随意性的歪曲与篡改。这种恶劣的幻术，现在人们都已把它识破了。在揭穿影射幻术的虚假之后，重新端正历史与现实的正当关系的时候，有些同志的文章对我很有启发，如有的同志指出问题在于历史如何联系现实，如何反映历史真实，又不脱离政治。在这个问题上，就同志们尚未谈到的地方，我想作几点补充，不一定正确，提请同志们指正。

（一）历史研究应当结合现实的需要，也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公开声明的立场。所以敢于公开声明，因为无产阶级是毫无偏私的，站在科学真理一边的缘故。但是要讲明说透，研究工作既要坚持历史的本来面目，又要结合现实的需要，那就不但应阐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还应分清历史与现实的差别，不然两方面的关系，就出现形式上的矛盾，有纠缠不清之嫌。

事物有联系就必然有区别；没有区别，也就没有联系的问题。前面说“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这既是联系，也是区别。还可以更进一步说，历史是稳定的凝结的现实，现实是流动变化着的历史。历史研究工作应以过去稳定了的现实为范围。当一历史事件，还处在变动不居的过程中的时候，它应不属于历史的范围，只属于现实的范围。比如抗日战争还开始不久，就研究抗战史，“文化革命”还在动乱着的时候，就写“文化革命”史，那是写不好，写不成的。一事件的过程还未终结，本质还未暴露清楚，就不要忙于作为历史问题来考察。马克思说的“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分析，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想从事后开始，从发展过程结果开始”^③正是说明这个道理。当然，历史家也不应当是对现实漠不关心。历史家，特别是现代研究者对当代发生的事件，要观察，要搜集资料和分析研究，但公开发表可以放到以后适当的时候。恩格斯就指出过当一些重要因素还处于“潜在活动状态”的时候，不可能得出一个历史的明确概念，“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鉴别材料之后，才能得到”。^④我们党的历史上先后两次所作的“历史问题决议”，也都等待活动的事态稳定之后。分清上述这一区别的含义，就有可能借以堵塞住惯于“上纲上线”者强把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的渠道。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视历史这门学问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中的重大作用。其实，历来属于剥削阶级的历史家，大多数也并不是把历史这门学问看作无用之物，至于少数主张“为历史而历史”，历史没有实在用处的说法，实际是另有“妙用”或在争为谁所用，这里暂不置论。我所考虑的是阐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是为了“用”，明确两

者的区别也是为了“用”。因为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总和本来就包含着“联系”与“区别”两个方面。不能得出联系等于有用，区别等于无用。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实际情况是每当发现它与现实生活关联的同时，也就在阐述着两者的区别。斯大林说“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⑤“重演”中会有联系，而“新的基础上”就产生区别。其他如“螺旋式的上升”，“更高基础上的重复”，继承与批判，继承与创新等等，都含有联系与区别的两个方面。所以说，历史对现实生活的用处，不仅在于阐明两者的联系，也在于辨析其区别。

我们还应该从历史这门学问所具有的几种基本性质上去看它的“用”（没有必要一一列举事例）：第一是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历史规律性。纷纭的历史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下，再不是主观的任人摆布的东西，也不是“乱七八糟的一团”（傅斯年语），它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规律性为人类过去历史的发展理出一条主线，预示人们以未来的方向，给劳动群众以要求变革的信心和斗争勇气。第二是历史的知识性，第三是历史的借鉴性。知识开拓人们的视野，是一种生活的力量；鉴往知来，借前人的得失成败照见自己的作为。这两种性质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前的中外古代历史家都已懂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排斥这两种性质。第四是对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性，通过学习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使人们增强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与自信、自立的精神和感情。用今天流行的话说，即爱国主义的传统教育。这四项是其性质中的荦荦大者。从四种性质中看历史学的用处，就不是“为当前政治服务”一句口号所可以概括得完全的。其中可以提供给现实作借鉴、求教训、鼓勇气、强信心的内容当然是很多的，但属于知识性的东西，如官制、年代、律令、灾异、宗教、谱系、礼俗等等，对现实政治生活不一定有直接的用处，但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用途。历史上的成败得失的事例，也不一定马上都可借鉴。即使是各种事物的发展规律，结合现实也不一定都可以照搬照用。由此，也正可以看出历史与现实之间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联系和区别，都可以归结为有用。

（三）历史研究与现实的正当联系，应是怎样的情况呢？方式内容或是多样的，但主要的也许就是两种：一是用严密的科学方法取得对某一历史现象的本质认识，拿出成果，提供到现实问题面前作为借鉴。这是从历史到现实之路。二是从现实问题的实践中领会到需要重温历史上某些与之近似的现象，加深对那一现象的再认识，最后当然仍归于用。这是从现实到历史之路。马克思由于精理解法国的历史，特别是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以来的历史进程，所以他能把一八五一年“举世震惊”而“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它”的波拿巴政变，迅速地揭示出它的实质，给予“政变的英雄”以“完全应得的蔑视”。这是从历史到现实的原则。毛泽东同志从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领会到以弱敌强，弱者应采取战略退却，待机破敌的原则，联想到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战例；特别对春秋时候的曹刿论战，给以新的解释。这是从现实到历史的范例。此外，如：把我国封建主义长期历史吃透就有利于考察我国人民反封建过程中的成绩和缺陷，把东西各国近代民主改革史弄清就有利于比较我国民主改革进程的得失；研究党史上前几次的“左”倾错误的表现，也可有助于理解以后“左”倾思潮的形式与根源，这又是从历史到现实。又如：从我们的运动战、游击战的实践中，重新检查历史上起义农民流动作战的成败；从我们的思想解放比较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异同；从林彪、江青一伙造成的危害重新研究历史上近

似现象的作用。这又是从现实到历史。这两种方式都是正常自然的联系。

这样的联系方式与林彪、“四人帮”发明的“影射”手法有什么不同呢？其不同就在于“影射”手段是把历史上与现实中两件不相干的事拉扯到一起，不惜用改削的手段使之类同、影射、混淆、甲变成乙，今就是古，武可以是今人，今人可以是海瑞。我们所说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延伸，严密的推理。恩格斯赞扬马克思《雾月十八日》说：这部著作“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自然和必然”是合乎逻辑的推论。我们虽然也在两者之间寻求其某些相承的渊源与若干近似之点，但仍然承认其差别而不是等同。上述联系各例，都可看出近似中的不同。再举些例证的话，譬如：古代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因素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古人的理想国、乌托邦，并不是我们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古代出现的限田，均田之类的措施并不是我们的土改法；古人的“罪己”、“直谏”也不是我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重视发掘历史与现实间某些联系，也要分清两者的区别。在区别基础上找出两者内在的，全面自然的联系才是真联系。这样就能圆满地说明历史研究“既要与现实结合，又绝不允许篡改历史”的道理。从而把主观伪造的假联系抛进垃圾堆里。

（四）历史与现实间的联系问题有没有矛盾的时候呢？这意思是说：历史与现实的区别与联系本来都是客观的存在；阐明它的区别和联系是要靠历史家主观能动的分析研究，把两者区别开来一般说不发生问题；把两者联系起来在一定时候，研究者就有所顾异，即产生了矛盾。研究遥远的古史，如考古学范围内问题，有顾忌的情况相对地少些；距离现代近的，顾忌的问题就相对地多一些。如现代史上的问题，由于它与现实问题息息相关，研究中随处感到它闪烁着现实性。讲出去，读者往往不容易辨别作者讨论的是历史，还是现实？主观上讨论的是历史，客观上都可能被推论到现实上去，言者无意，闻者有心。这就是现代史工作者下笔时顾虑较多的症结。不能否认，这种情况是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种问题。我想，仍应该从分清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入手，即使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现代史，也应找出它的区别。结合我们十年动乱的切身经验，区别它更富有现实意义。

区别的办法，首先仍应运用前面提到过的原则，即区别现实是稳定了的，还是没有稳定。稳定凝结了的活动才是历史，未稳定下来的活动还是现实。在现实中发生发展着的事物到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还不可以纳入历史范围的界标？我想，一是事物的发展过程出现了阶段性，即“告一段落”；二是事物的本质已暴露到十分之七八，人们大致对它各有了一些片断的、却又是共同的认识；三是具备了足够说明问题的材料。到这时，这些问题大体上就可以作为历史问题来探讨和总结了。列宁曾提出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须具备的主客观条件是：（1）具备深刻的哲学世界观；（2）具备足够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材料；（3）要有经验本身的成熟。⑧毛泽东同志讲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一系列著作，也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之后，“才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以前不可能”产生。⑨所以，研究现代史也要在事物经历了一定时间，主客观条件成熟之后才可以，不能认为只要是“过去了的”昨天或前天的事，就可以当作历史拿来研究。承认这个区别，是解决上述矛盾的

前提。

其次，历史研究是以真实为基础的。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怎样就怎样，秉笔直书，不应有所避忌。“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⑩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剥削阶级政治家的活动不在我们的论列之内）却不同。一个事件、一种情况该不该讲，有“时机”问题，有“策略”问题。当然承担着解放全人类使命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们的活动，归根结底是光明正大的；但在推进各项工作的进程中，随时会出现变化的主题，也有为无产阶级利益所必需的策略。如当前台湾回归祖国问题，与各国关系问题，开放政策中的许多问题等等，应不应讲，什么时候讲，讲些什么，从政治上考虑都不是径情直遂，无所斟酌的。如果与此有牵连的历史问题（特别是现代史），其内容，趋向，与现实中的主题精神相一致，那自然好。但历史上的主题内容，论证起来与现实中的主题不协调，有分歧是经常有的。碰上这种情况时如何抉择呢？不必迟疑，我们的历史工作者应首先尊重现实中的主题。这不是要历史家放弃自己的职责，而是论证历史问题的任务与现实中之斗争的任务有轻重缓急之别。把进入历史档案中的问题暂时放置不做，将来可做，后人可做。这与涂抹篡改者不同，无损于历史家的风格。这样做，是历史家与人民在现实中统一步调，保持一致，表现其政治上的严肃性，同时也无害于历史科学。

第三，历史家的分析判断要求客观、冷静，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有临时爆发的义愤。越是新近的事越是敏感。作者虽然探索的是往事，而读者却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有感情，有好恶，就有义愤。人们在刚发生的事件中所受到刺激，联系到事与人的善恶美丑，或是切齿痛恨，或是悼念惋惜。这种爱与恨往往只能联系到共事共人的最突出的部分。如果一位学者偏在这时做起与群众好恶相反的历史性文章（当然是“全面”一点），就定会惹起读者的反感。这是一个历史与现实本应区别而一段时间内却发生纠葛的问题。遇上这种情况，历史家的思考应回到现实中来，很好地冷静地去理解大多数人的好恶的由来和其中所包含的正义因素。并且，群众的感情还在激荡着的时候，就表明事态还没有进入历史的范围。当然，历史家的笔下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立场和是非好恶，但那是冷静分析中的爱与恨，与现实临时突发的情感不同。遇上这种情况，也要善于分清历史与现实的界限。

历史家的精神生活，实际上经常地往来于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因此，要申明一点：历史家在现实生活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好恶，是以激发群众感情的事件之大是大非已经判明为前提，并非说要做随声附和的庸人。如果群众激情下的是非判断根本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也有），那另当别论。只是在是非真理虽已判明，但纳入历史范围中来检查，其真理性还不完全的时候，就需要在事态冷却之后历史家再回到历史王国中来执行自己应有的职责。上述这种情况，作家、学者，乃至各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经常遇到的。鲁迅讲过一个故事，大意是：一家人生了一个男孩，贺客们多是就孩子命运讲些吉祥恭维的话，赢得主人高兴。一个贺客讲了句：“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遭到主人的痛打。我们把它再引伸下去，如果是过了几年、十年、二十年之后，这孩子（或是成人）不幸死去，那时你再对主人说“人总归是要死的！”主人至少不会再打你了。现实与历史的差别于此故事中，也可略得其“三昧”。

(五)在这个题目下,还有几项片断的应有之义,应补充说明。一个是在解放思想的同时,我们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现实的问题,还是历史问题?好些同志的文章已经指明,这既是现实的生活准则,又是近百年的历史总结。两者精神趋向既然一致,就无需乎再用脑力去考虑其区别,但如果一定要问它的区别何在?那就是:四项原则通过哪些历史上具体的经验,比较分析而被认识和显示它的权威性质,这就是历史家活动的领域和应尽的职责。至于作为现实生活准则,无须多说,而两者的区别也就不言自明了。同时历史研究中的四项原则,不局限在近现代史的范围中,凡是用科学的方法,严肃认真的对待资料,实事求是地去分析研究,无论是古今中外,都可以做出不背离四项原则精神的成果。再一个是:报刊上的言论,要求强有力的现实性;课堂教材、专著作书要求完整的系统性。历史学者当其神游于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时侯,在不同的领域里要不同地对待,避忌与否不能一概而论。末后一个是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我们说: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总和,包含着联系与区别的两个方面。“联系”不是实用主义,“区别”不是机会主义,都是以客观真理为前提,都是以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为目标,都不是与现实相分离脱节的。因此在提法上说“历史研究不脱离现实”,似不如说“历史研究者不脱离现实”更确切些。鲁迅说过“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出来的都是血”。⑫革命文学的根本问题首在作者是一个“革命人”,历史家根本应是一个不脱离现实的革命者。

注释:

- ①《李大钊选集》第94页。
- ②《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四期张友渔、刘大年同志的两篇文章对此有所阐明。
-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92页。
- ④同上,第二十二卷第591页。
- ⑤《列宁主义问题》第207页。
-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1页。
- ⑧《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94页。
- 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
-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347页。
- ⑪《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96页。
- ⑫同上,第三卷第408页。

(原载1982年《历史研究》第6期)

北洋军阀各派系的统治及其特点

彭 明

1982年10月

- (一) 北洋军阀产生的社会基础
- (二) 北洋军阀各派系的剖析
 - (1) 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开山祖
 - (2) 段祺瑞——皖系军阀的反动统治

(3) 曹锟、吴佩孚——直系军阀的反动统治

(4) 张作霖——奉系军阀的反动统治

(三) 北洋军阀统治的若干特点

中国现代史上有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经济史，我们研究很少；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得也不够。作为历史科学来讲，经济史是历史的骨骼，政治史是历史的血肉，思想史是历史的灵魂。而经济史、思想史空白点很多，政治史也没有搞很多，我们基本上搞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对敌人、对朋友情况所知不多或毫无所知，很多问题讲不通讲不细。因此，党史教学应该结合近、现代史。最近一位领导同志看了《日本侵略罪行》展览后对搞民国史的同志说：民国史出了，反映不错，实事求是，将来写抗战史也要实事求是，国民党抗战也要写，抗战一开始就说消极抗战不确切，相持阶段后才消极抗战，抗战开始时是片面抗战。表述准确，才能使人信服。

由此，我联想到两个问题：1938年春的台儿庄战场，国民党宣传消灭敌人3万多，日本发表的资料说死2千多，伤9千多，共1万多人。在抗战初期，这也是很了不起的。国民党在抗战中，也是有牺牲的，如张自忠，原是冯玉祥部下，国民党33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襄樊战役中被围，身中数弹，最后拔剑自杀。其夫人在上海听到消息，绝食七天七夜而亡。台湾把这段事迹编成电影《英烈千秋》，上座率最高。象张自忠这样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将领，在国民党中虽然是凤毛麟角，但还是应该肯定的。总之，要实事求是，有些应该肯定的事实，不承认，不公正。从北伐到解放，我们对国民党研究不够，对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具体分析不够，对民主党派，也很少有人系统研究过。如对冯玉祥等人如何评价，也没有很深入的研究。对全部北洋军阀的历史更研究不够，讲个例子，有一个研究班口试，抽了个北伐战争题，北伐胜利的原因讲得头头是道，但当我问他北伐是伐谁时，他却回答不出。革谁的命不知道，革命性质、任务怎么弄得清？

以上作为引子，目的是引起大家研究北洋军阀的兴趣。

(一) 北洋军阀产生的社会基础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史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产生原因首先要从社会基础上看，分析中国社会半封建性质，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是经济特点，二是阶级关系。

从经济特点看，半封建，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分解了封建经济，但封建经济还占着显然的优势。这个“半”不是数学概念，不是50%，而是指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生，发展。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分解封建经济，主要在沿海，广大内地还是封建经济占优势。封建主义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了主要地位。也就是说小农业、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生产经济。吃的靠小块土地种的粮食，穿的靠自己种棉花织布，虽有商品交换，但不占主要形式。这个特点在历史上叫“男耕女织”，自然经济，自给自足。许多文学作品都反映了这个经济特点，如“天河配”的牛郎织女，就是男耕女织么！从“天河配”到“天仙配”，甚至到陕北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个经济特点给军阀割据创造了条件，它可以经济上自给自足，经济上支持了割据。这点与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同，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铁路、公路、飞机四通八达，搞割据不行。近代以来，军阀

也搞些工业，但这工业也带点封建性，铁路路轨、车型应该统一的，而山西阎锡山建的正太路，就与众不同，窄轨的，他能打出来，但你打不进去！

从阶级关系上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还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的尖锐和发展，需要地主阶级的武装来镇压人民。如近代湘、淮系军阀，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就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而产生的。北洋军阀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不仅如此，北洋军阀本身实际是地主阶级的一员，不管他们出身怎样，如曹錕是卖布的、吴佩孚是穷秀才、张作霖是赌场的小伙计，一旦他们成为军阀，都广置财产，占有大量土地，成为地主阶级一员。袁世凯，河南项城人，在彰德、汲县、辉县几个县搞了四万顷土地。袁世凯的文官徐世昌在辉县有五十顷。段祺瑞在东北占荒地二十万顷。冯国璋，河间人，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过，河间府土地都让冯国璋买去了。张作霖在北镇县占地一千余垧（一垧十亩）。这是几个出名军阀，其他小军阀也是如此。

封建经济特点，不是近代才有，为何以前没有北洋军阀？还要分析半殖民地性质。完全的殖民地，一个国家占一个殖民地，不会象中国这样产生各派军阀。中国是半殖民地，已经丧失独立，但还没有完全丧失独立，还有个政府，半独立的。造成这种状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有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他们之间争夺，谁都独吞不了。二是更根本原因，中国人民的反抗。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使帝国主义没力量全部占领中国，各自扶植一个代表来占领，造成半殖民地。虽然各帝国主义不能独占，但各占有势力范围。大体如下：长江流域英国；长城以北沙俄；山东德国；福建日本；两广法国。

归纳一下，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一条是“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一条是“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这两条，就使军阀派系林立、军阀战争不可避免。

（二）北洋军阀各派系的剖析

北洋军阀统治中央政权，从一九一二——一九二八年，四个派系的军阀头子各统治四年，共十六年。

（1）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开山祖（一九一二——一九一六年）

北洋军阀的历史要追溯到湘、淮军，它们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产物，是由地主团练发展起来的，充满了封建性，它们又利用外国武装洋枪洋炮，与外国侵略者相勾结，又有买办性。近代军阀的特点——封建性、买办性，它们都具备了。

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办了个北洋武备学堂，目的是为淮军培养军官，北洋军阀的首脑人物很多都是这个武备学堂的学生。如号称“北洋三杰”的（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都出身于这个武备学堂。

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失败，感到非用外国办法改进军队不可，“朝廷恫丧师，知募兵不足恃，命（胡）燏棻主练兵，成十营，顿小站，号定武军。小站练兵自此始。”胡燏棻练兵成绩不太大，后来换了袁世凯。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住在项城以北十几里地的张营，有地四、五十顷。祖辈父辈都是清朝大官，叔祖袁甲三，在北京做官，与曾国藩、李鸿章交往密切，官达礼部主

事。袁世凯二次省考未中，只得个拔贡生（秀才）。古代知识分子二条出路：一条学书，接科举道路往上爬，一条学剑，练武行伍。袁世凯学书不行，另找出路，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一八八一年，袁去山东登州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一八八二年随淮军到朝鲜镇压兵变，立了功劳，被吴长庆派在朝鲜练新兵。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回国，清政府派他到小站接替胡燏棻练兵。胡练定武军约五千人，袁接练时扩充为七千人。这就是北洋系军阀的由来。因此，北洋系又称小站系。

为什么叫北洋系？李鸿章、袁世凯先后曾任北洋通商大臣。

一八九九年，袁世凯被任为山东巡抚，小站训练的军队也随袁调走；一九〇一年，袁因镇压义和团“有功”，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其军队又随袁回到了小站。随着袁的权力的增长，小站军也迅速扩大起来。一九〇三年，袁仿照外国陆军改革军制，其建制顺序为军、镇、协、标、营、队、排、棚（也就是相当于后来所说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每棚十四人。一九〇五年，形成北洋六镇。一九〇六年，清政府设陆军部；次年，令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这一计划，并没有全部完成。至武昌起义前夕只编成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四个标，及一支禁卫军。但北洋六镇始终是新军的主力。（北洋六镇实力约八、九万人）

一九〇八年，光绪，慈禧先后死去，宣统继位，光绪的兄弟摄政王当权。袁因向慈禧告过密，出卖了光绪，摄政王这时要杀袁。在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令袁以养病去职，袁回河南在彰德洹上村，住在别墅里，吟诗作赋，撑竿钓鱼，身披蓑衣，还拍了照片登在上海杂志上，做出不问朝政的样子。而实际上仍然是北洋军的幕后指挥者。它的别墅里有专门的电报房，北京清朝中枢的举动，他靠着部属的情报，了如指掌。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南方各省新军纷纷参加起义，清政府调不动北洋军，不得不请出袁世凯，袁不干，最后清政府不得不把内阁全权交给了他，他才打武昌。于是，袁世凯依靠着他的北洋军实力，一手让清政府退位，一手与孙中山谈判。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不清，认为袁世凯是汉人，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谈判，袁用左手打清政府，右手打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当了三个月大总统交了权。开始时，孙中山还对袁有戒心，让他当中华民国临时总统，但政府必须放在南京。孙中山派蔡元培北上接袁，袁叫曹锟搞了二月二十九日兵变，造舆论表示不能离开北京。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孙中山还想约束袁，通过临时约法，规定一个责任内阁，总统要受内阁制约。第一任内阁总理由谁当？袁提名唐绍仪，唐是袁在朝鲜时文职亲信，唐又是孙中山同乡。孙认为内阁总理由同盟会当，结果唐加入同盟会，孙中山作了妥协。袁还独断专行，唐对袁不满，结果辞职。赵秉钧接任内阁总理，赵是河北保定人，训练警察的特务头子。

一九一二年八月廿五日，同盟会改为国民党，这时已不同于同盟会时的革命派，政府官员加入，成分复杂。孙中山为名义理事长，实际由宋教仁代理一切。

一九一三年二月国会正式产生，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国会中国国民党议员占优势，宋教仁认为他可以仿照西方组阁，到处宣传施政纲领，从湖南、湖北到上海。一九一三年三月廿日宋教仁在上海站准备登车北上时，赵秉钧派人把他枪杀。宋的被刺给革命派以教

训。一九一三年七月革命派发动了“二次革命”，但已经晚了。正如柳亚子追悼宋教仁时所说：“操刀慳一割，滋漫已难图”。

对宋教仁评价：他醉心于西方民主，南京临时政府的许多法令宋起草的。但他对袁有幻想，宋为实现西方议会制度献了身，对他应一分为二。六十年代宣传“九评”时把赫鲁晓夫议会迷与宋教仁联在一起批，这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搞资产阶级议会搞什么？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什么？

封建军阀都是皇权主义者，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不以临时总统为满足，解散国会，修改约法，一九一三年十月十日当正式大总统。一九一五年，大造舆论，让美、日顾问造舆论，说中国国情只有君主制适合。如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论文宣传中国君主制。袁世凯让其亲信杨度组织筹安会。杨度在帝制失败后被通缉。此人后来有很大变化，二战时加入共产党，周总理单线发展的，专做军运工作，三十年代死去。但搞筹安会是历史上的丑事，为袁世凯抬轿子。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称帝。全国各地纷纷反对。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在云南打出护国讨袁旗帜，接着各地起义反对。包括袁世凯周围亲信也不赞成，段祺瑞也告病假，跑到西山不出来。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九一五年一月为订“二十一条”支持过袁世凯，后来看形势不好，准备换马，培植段祺瑞。因此，一九一五年十二月日本也通牒不同意袁的帝制。

在内外交困情况下，一九一六年三月袁宣布取消帝制。取消法宪年号，当了不满百天的皇帝。最后众叛亲离，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羞愤而死。

袁世凯死后，各界人士发表各种各样评论总结军阀统治。其中黄炎培（时任江苏教育会副会长）写了文章，从教育、道德观念总结九条教训，其中一条说：“凡违反大多数人心理者必败”。再一条说：“欲取大巧，适成大拙”。又一条说：“欲屈天下人奉一人，必当尽天下人敌一人”，“以诈伪尽掩天下人之耳目，终必暴露；以强力禁遏天下人之行动，终必横决”。

（2）段祺瑞——皖系军阀的反动统治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二派：一个是皖系，一个是直系。

皖系以段祺瑞为首，段安徽合肥人，称皖系。

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冯直隶河间人，称直系。

这两派所以产生，袁死是个原因，但更深刻的原因是受不同帝国主义的支持。列宁在一九一六年写的《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瓜分中国才刚刚开始，日美等国争夺中国的斗争愈来愈激烈”。事实正是这样，一九一六年以后，日本支持皖系，英美支持直系，在中国展开了剧烈的斗争。这二个派系分别掌握中央政权四年，一九一六——一九二〇年皖系控制，一九二〇——一九二四年直系控制中央政权。

皖系统治时期的手法：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段的祖父是淮军将领，镇压捻军起家的。段幼年随祖父读书，后考入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李鸿章送其去德国克虏伯炮厂学习，是北洋各派系头子中唯一出过洋的人。段从德国回来后，协助袁世凯编练新军，当过三、四、六镇首领。民国以后，一九一二——一九一六年历任北京政府陆军总

长，手中有军权。袁世凯称帝他请病假。袁死后，他掌握军权，当了内阁总理。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但实权在段祺瑞手中。不久，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张勋复辟，到十二日，共十二天。

张勋，江西人，清朝时带兵守皇宫大门的。南方二次革命时，袁世凯派他与冯国璋到南京镇压，后驻守徐州。他是清朝政府的坚决维护者，辛亥革命时他和他的军队都不剪辫子，所以叫辫子军，张为辫帅。袁世凯死，张勋从反面总结教训，很荒谬地说：袁世凯恢复帝制不错，错在袁不应出来做皇帝，袁不是爱新觉罗家的。应该叫溥仪出来称帝。

张勋复辟要从段祺瑞和黎元洪矛盾说起。“府院之争”，矛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问题上爆发，段祺瑞主张参战，黎元洪反对参战。反映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本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时反对中国参战，一九一七年日本已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它在山东取得特权，因此赞成段祺瑞参战。而美国最初主张中国参战的，一九一七年时发现日本利用中国参战而得利，因此，反对中国参战。段祺瑞把各省督军调到北京要挟黎元洪参战，黎元洪要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张勋时为安徽督军，在徐州拼凑十三省同盟，表示愿意入京调停。张勋带领辫子兵先到天津，发出通电威逼黎元洪解散国会，接着进入北京，他的目的不在调停，而让溥仪复辟帝位，康有为配合起草诏书。

段祺瑞原来利用张勋反黎，在张勋复辟后，又在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辫子兵，而以再造民国的元勋自居。

段祺瑞的统治手法：

第一个手法，利用张勋复辟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自居，他不当总统而掌实权。他比袁世凯、张勋狡猾。

第二个手法，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段在再上台后对外宣战，但没有与德国直接作战，而借宣战名义借债扩大他的军事实力。对南方实行武力统一，不宣而战。

第三个手法：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旧国会在张勋复辟时逼黎元洪解散了。这时研究系梁启超出主意不要恢复旧国会，另搞新国会。研究系想操纵新国会，段祺瑞不干，组织安福俱乐部，活动在安福胡同，所以称皖系为安福系，操纵国会选举，安福系在国会选举中占优势。这就是打着民国招牌的安福国会。

第四个手法：竭力破坏南北议和。一九一八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国人民，各界名流都要求消除战争南北议和。这一愿望也反映英美派要求。因为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扩大了势力。有独霸之势。英美赞成南北统一。段祺瑞与徐世昌不得不同意在上海开南北议和。而日本反对，段祺瑞派王揖唐破坏议和，以维护皖系统治。

第五个手法：段祺瑞统治，卖国程度超过其他军阀。以参战为名，借款五亿元，大量利益出卖给日本，出卖山东，并允日本修两条铁路深入内地，修路借款谈判，章宗祥签的换文“山东问题秘密换文”，章宗祥签了“欣然同意”，给以后巴黎和会日本强占山东以口实。所以，五四运动提出：打倒皖系！打倒卖国贼！打倒安福系！直系吴佩孚也发表通电反对皖系。五四爱国运动，使皖系彻底孤立了。

一九二〇年七月，爆发了直皖战争，吴佩孚原来是被派到湖南去打南方军阀的，这时吴不干了，北上。奉系张作霖带兵入关，直奉联合打皖系。七月十四日——七月十八日，直皖两军在京汉路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等地打了四天，皖系失败，随之安福俱乐部解散，段祺瑞被通缉跑到天津。直皖战争结果，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又扶植奉系军阀，以后又发生两次直奉战争。

(3) 曹锟、吴佩孚——直系军阀的反动统治

直系曹锟、吴佩孚势力的形成：

直系首领原来是冯国璋，河间人，字华甫。

冯国璋在安福国会成立后被排挤掉了。黎元洪总统，冯国璋付总统。段祺瑞搞安福国会，抬出徐世昌当大总统。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间，冯国璋因病死去，冯国璋死后，直系军阀首脑人物是曹锟和吴佩孚。

曹锟，字仲珊，直隶省天津人。父是天津小商贩，本人是推车卖布的。曹锟二十岁时投淮军当兵，后入了天津武备学堂。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任右翼步兵一营帮带。一九〇三年，任新军第三镇统制。辛亥革命后，任第三师师长，袁世凯死后，曹任直隶督军，驻保定。

吴佩孚，号子玉，山东蓬莱人，出身小商家庭，本人中过秀才。他早年曾在北京以摆卦摊算命谋生。一八九八年到天津当兵，辛亥革命后任曹锟部下的标统（旅长），代理师长。逐步与曹锟一起成了直系的首脑。

直系和皖系的分歧：从表现形式上看有两点不同：

一是对南方军政府态度不一样，段祺瑞主张打，直系基本倾向于和；二是对五四爱国运动的态度不一样，段祺瑞一伙替曹，章、陆说话，赞成在和约上签字，彻底卖国；直系则在一定程度上对五四爱国运动表示了同情，不主张签字，曾发了许多通电。

如果抛开形式，进一步看实质，直皖的不同则在于：

一是在中央政权所处的地位不同，皖系掌握中央政权，直系则不掌握，所以对南方军的态度不一样。二是依靠的帝国主义不同，皖系依靠日本，直系则倾向英美，所以当五四运动主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时，直系可以支持。

正是由于上述的不同，于是便在一九二〇年七日，爆发了直皖战争，直系联合奉系打败了皖系。

直皖战争后，直奉间的矛盾尖锐了。下面再讲讲奉系：

奉系以张作霖为首。因为张是奉天海城县人，所以称为奉系。张作霖，字雨亭。父亲是一个开设小商铺而又常“放局抽红”的赌徒，张本人也常出入赌场作小贩生意。甲午战后，他结识了绿林各帮（“马胡子”），而被人视为“窝主”。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事件后，他当了“保镖队”头目，不久接受清政府地方当局改编。一九〇六年奉天全省旧军编成八路巡防队，张任前路统领。辛亥革命后，所部改编为师，张任师长。袁世凯统治时期，他一面讨好袁世凯，一面投靠日本帝国主义，逐步成为奉天省最有实力的人物，一九一六年，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并在一九一九年前后把整个东三省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自成体系，称为奉系。

直皖战争后，直奉间矛盾，特别是吴、张之间的矛盾扩大了。吴佩孚是直系中的实力派领袖，有能力，会打仗，曹锟非依靠他不可，吴又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因此他自认为自己的地位可以与曹、张平起平坐，可以以同等地位与曹、张讨论善后问题。但张作霖以吴仅为一区区第三师师长，不足与其相抗衡。曹锟虽以联姻手段联络张作霖，但这时的吴佩孚已羽毛丰盛，对曹仍保持一定距离，不肯轻从。

直皖战争地盘瓜分的结果：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并相继兼任蒙疆经略使，热、察、绥三个特区，皆归其节制。曹锟继任直鲁豫巡阅使，任命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副使。这时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原属直系，张作霖曾计划联王反吴，但由于湖北王占元部发生兵变（不反吴），这样，就逼迫王占元也不得不把两湖巡阅使的职位让给了吴。

吴佩孚势力越来越大，吴张之间的矛盾一天天扩大，终以梁士诒组阁为导火线，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皖战争后的第一任内阁，是以对直奉双方都能保持平衡的靳云鹏组成的，但靳阁财政困难，无法支持。到一九二一年秋冬之间，各部欠薪已积至二十个月。同年十二月，靳阁倒台。奉系支持交通系外号“财神”的梁士诒组阁。梁曾任袁世凯的秘书长，并历任内阁的交通总长、税务处督办，并掌握交通银行，盐业银行等。梁因这样的地位，就造成了在中国政界的一种势力，即交通系。梁的组阁，表面上得到了曹锟同意，但为吴佩孚所深深不满。

梁组阁后，曾被通缉的皖系分子均被赦免，吴又不满。另一方面，从经济上看，在军队筹饷问题上，吴佩孚也和其有矛盾。梁阁为奉系所支持，奉系饷源自可不成问题；而吴佩孚几次索军饷，均未得实现。

这时，华盛顿会议正在讨论山东问题，梁为了取得日本财政的援助，竟令中国代表对日表示退让，允日使要求。于是，吴佩孚乘机逼梁下台，一九二一年一月，吴连续发出反梁通电，并联合苏、赣、鄂、鲁、豫、陕六督及省长，要求罢免梁士诒。张作霖则发表宣言反击，称“为维护体面计，亦万不能使已所拥护之人被斥去位”。

经过一番舌战之后，一九二二年四月，张作霖调奉系入关，号称“镇威军”。四月二十五日，吴佩孚率直系各督联名通电，宣布张作霖“十大罪状”。四月二十八日张作霖亲自到天津附近的军粮城任镇威军总司令，分兵二路向直系进攻。四月二十九日，战争爆发。西路在长辛店一带，东路在马厂。战争以西路最激烈，（担任西路的直系军指挥是冯玉祥）西路奉军首先溃败，第一步退到军粮城。接着东路也垮了，第二步退到滦州。

到五月五日，在直系的指使下，大总统徐世昌命令奉军退出关外，并通缉梁士诒。十日下令免掉张作霖的职务。六月，在英国的调停下，直奉战争结束。奉系在日本的支持下，宣布东北“自治”。

直系吴佩孚打败奉系后，积极推行“武力统一”的政策。吴原是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因为那时是皖系掌握中央政权。现在直系控制了中央政权，地位不同了，所以也高喊起“武力统一”了。

直系连续打败了皖系和奉系，反映了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得势，它打破了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梦想。而吴佩孚等在战争中屡建功勋的将领，也就更为美国侵略者所垂青。所以美国一方面在军事上积极进行对吴的帮助；另一方面，也在政治上筹划如何